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

# 再谈大学教授为什么要做科研

■郭英剑



“教学型教授”只是时代产物与过渡现象。除非制度坚持要如此设计,否则未来会销声匿迹。“教授”的职责清晰明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未来,不仅不会有“教学型教授”,也不应有“专事科研而不进行教学的“科研型教授”。

最近,有媒体对高校聘任将没有一篇论文的教师晋升为教授进行报道,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大学教授要不要进行科研”这一现象的热烈讨论,其中也对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多有批评。为此,我也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也看到了高校内外人士的一些观点,这促使我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思考。

## “教学型教授”不过是过渡性现象

我首先想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当人们在讨论“没有一篇论文就可以当教授”这样的社会热点时,无论是点赞与支持的一方,还是质疑与批评的一方,都需要清楚地意识到,像这样的讨论及其话题都只不过是过渡性话题,“教学型教授”也只是时代的产物,属于过渡时期的现象。如果我们往前看10~20年,这样的话题就不会再有了,这种分类未来也可能会销声匿迹。

之所以说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有一些(甚至是不少数量的)“50后”“60后”甚至是“70后”学者,他们在进入高校工作前后,因为历史或者个人原因而没有攻读博士学位或者相关行业的最高学位,因为对于科研的认识有偏差而不够重视,或者就是对科研不感兴趣,或者是科研能力有限等种种阻碍或者障碍,他们几乎不从事学术研究,也没有相应的科研成果,但其中的一些人教学水平确实很高,深受学生欢迎,这种现象的确是存在的。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上述现象在“75后”的学人成长过程中,几乎不会再出现了,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博士学位或者相关行业的最高学位,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研究训练,没有相应的科研成果,甚至没有优秀的科研成果,他们

根本就进不了高校!

因此可以说,除非未来高校的职务聘任制度非要做出这样的设计,否则这样的讨论话题与职称分类,在未来10~20年间大体上会烟消云散。

## “教学型教授”并非破除弊端的良药

虽说我个人以为未来“教学型教授”会消失,但在当下,“教学型教授”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我对此非常理解也完全赞成。然而,在大家热议的过程中,也有一种声音由此批评现行评价制度是完全的科研型教授聘任制度,认为是这种制度造成了“教授不教书,教书的评不上教授”,并因此认定设置“教学型教授”的聘任制度是打破现有评价弊端的利器。对此,我并不认同。如果到我国各高校去看看,哪里有高校会(或者敢)抛弃教学方面的要求而仅要求科研?再来看看现在评上教授的学者,哪里有教学不达标的人存在呢?

当然,我也理解上述说法的由来。稍微注意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各个高校对于教学的要求几乎大同小异。比如要达到一定的课时量,要求教学评估的优秀率在90%甚至95%以上,要求获得过校级以上等相应的教学优秀(成果)奖等,但这些对于那些申请高一级职称的学者来说,可能根本不是问题。

根据我个人多年参加职称评审的经验,几乎很少见到过教学工作未达到学校最低要求的人能够走到最后阶段而获得通过的。但也正因为在教学方面大家都全部符合学校要求,即单一靠教学很难分出高下与胜负的时候,大家只能更多地参照申请人的

科研成果多寡、发表何种级别的文章、出版在何种级别的出版社等等科研方面的要素了。

虽然我个人赞同当下中国高校所推行的“教学型教授”,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打破现有评价弊端的利器。一是现有“教学型教授”的出现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权宜之计,相信未来会逐渐消失;二是世上没有万全的评审制度,也没有万全的制度,甚至可以说,任何评审制度都会有难以弥补的缺陷,人们很难找到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完美无瑕的职称评审制度。鉴于此,我个人认为,各个高校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与需求设置“教学型教授”这样的岗位,以满足高校的需求,也弥补制度设计之不足。

## “教学型教授”看上去很美 尝试者不多

有记者问我,他们通过调研得知,虽然不少高校都实行了“教学型教授”制度,但好像并没有太多的人愿意走上这条路,其原因何在?大学教授是否可以“分型而治”?

较少人愿意选择这条道路,我个人推测原因有三。

首先,“75后”学人,其学术成长道路与前人不同,他们不会再有那样的历史遗憾、思想意识,他们对于进入高校后的教学、科研、服务三大任务,应该说有着清醒的认识;现行的“教学型教授”岗位的出现,很难对他们产生真正的影响,甚至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岗位设置并不一定是他们未来学术人生正确的打开方式,或者至少不是他们未来要选择的一条学术道路。

其次,除非制度性设计长期存在,

否则那些还愿意在高校要求进步、希望未来能够晋升到教授职称的青年学者,很难做出主动放弃自己多年的学术训练、学术修养、学术成果而仅去做一名教书匠(在这里说“教书匠”,只是全心全意教授而不做科研的意思,绝无贬义)。这期间风险太大,很难有人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即便是没有博士学位而进入了高校,在工作期间读博并拿下博士学位者,这不单单是青年教师个人的学术追求,也将是时代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与高校对青年教师的必然要求。

最后,从现在的“教学型教授”岗位设置来看,一是名额少,甚至是很少;二是“教学型教授”的设置,在很多高校并不是不要科研,只不过是降低了一些科研成果的标准,提高了对教学的要求而已,甚至可以说是对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谓名额少,大家有目共睹;所谓要求高,是除了满足那些基本的教学量、教学评估、教学获奖外,估计还要在所在高校具有一定的教学知名度,这最后一条并不容易达到。像当下媒体所热捧的获得了“教学型教授”职务者,在他们所在高校大都是凤毛麟角,为数极少。

由此我判断,很少有经过多年学术训练的博士或者青年学子冒险在自己未来的成长道路上放弃科研。

我认为,在高校中,大学教授不能“分型而治”。大学不能有只管教学不做科研的教授,也不能有只做科研而不从事教学的教授,原因很简单,教授这一职称所具有的职责——教学、科研与服务,应该是缺一不可的关系。

其实,现在高校中更应该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到底该不该设置“科研型教授”?这个类型的教授,现在在很多高校

都有,但讨论的却很少。

## 大学教授做科研 是多少而非有无的问题

有记者问,“一名合格的大学教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在我看来,这样的问题太难回答,因为“素质”这样的词汇太抽象,也很难衡量。就“大学教授”而言,我觉得更应该讨论的是,“一名大学教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者达到怎样的标准才算合格?”

简单而言,一位学者想成为大学教授,就要按照教学、科研与服务这三大职责去要求自己。凡是能够达到这三方面要求的——既要给本科生、研究生上课,还要从事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自然还要参与各种高校内外的社会服务工作——才能算是达到了一名合格大学教授的基本要求,也才能算是一名合格的大学教授。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在高校中,教学与科研既是一种平行关系,二者不可偏废,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大学教授而言,在讨论其科研的时候,可以讨论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有无的问题。

我一直以为,在现在的中国高校中,可以不对助教、讲师甚至副教授做出科研要求,但应该对大学教授包括“教学型教授”提出一定的科研要求,包括数量与质量。对于“教学型教授”的要求可以降低,或者给出一个最低要求,但至少应该有要求。既然是大学教授,就应该从事学术研究,并有学术成果发表与出版。

“教学型教授”是未来会消失的话题,但对于教学的讨论,特别是如何平衡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则一定是未来常说常新的话题。

# 澳大利亚荒野上的地质实习课堂

■本报通讯员 陈华文 郭晨彬 刘思祺

暑期,是大学生一年当中难得的放松休息时光。然而,对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类专业学生而言,暑期却是他们背起行囊、跨越层层山峰,在野外开展地质实习的“好时节”。

野外地质实习和课堂教学对于地质类专业学生来讲同等重要。近年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类专业的野外实习,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展,而且走向了世界。7月底,该校资源学院与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刚刚完成了联合野外地质实习,学生们在海外度过了18天难忘的地质时光。

## 国外地质实习吸取新鲜知识

近年来,为加强实习教学内涵建设,拓宽学生国际视野,培养国际化一流学生,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积极开展多项海外交流项目。而该校与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合作开展的联合野外地质实习,便是其中之一。

为了组织好本次实习,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学院从资源勘查工程大三本科生中,经过外语、专业能力、体能等各个方面的考察后,选拔出10名大学生参加海外地质实习。带队教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教授李占轲说:“这些学生中,9人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乘坐飞机。”

詹姆斯库克大学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海滨城市汤斯维尔,是该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之一。此次的实习地区位于昆士兰州西北部的矿业重镇芒特艾萨一个世界著名的矿产资源产地,其主要包括了喷流沉积型铅锌矿床、铁氧化物铜金矿床以及砂卡岩型铁铜—钼矿床等矿床类型,是詹姆斯库克大学的传统实习区,也无疑是地质研究的理想课堂。

由于该地区地质演化历史较为复杂,尤其是元古代,经历了两期大的造山事件和多期变形变质及拉张盆地事件,地质现象极为丰富。元古代以后构造演化日趋平静,使得原有地质现象得到了很好保留。而实习区的植被不甚发育,露头裸露条件较好,非常便于观察地质现象。

野外地质实习同课堂教学一样,都有系统的方案和教学进度,澳大利亚野外地质实习也是如此。此次地质实习采用了全英文授



中方学生与澳方学生合作进行地质填图实习

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地质填图培训、分组独立填图和典型矿山考察。在实习过程中,学生不仅进行了实地踏勘,培训大比例尺网格填图技能,更与澳方学生3人成组,在芒特艾萨中部地体玛丽凯瑟琳地区持续多天进行小组独立填图。彼此间的交流合作,拉近了学生的距离。

识别实习区岩石岩性、构造、蚀变和矿化等地质现象;开展大、中比例尺综合地质填图;制作沉积地层柱状图和构造赤平投影图……学生们在澳大利亚荒野上的地质实习课堂中不断给自己“充电”。

“本次地质实习的目的,就是期望同学们能够运用所学地质基础知识,在岩石和矿物鉴定、地质填图技能、综合地质分析、专业英语和口语等方面得到全方位的锻炼。”李占轲说。

## 野外实践课堂克服重重阻碍

实习的头两天,惊喜于野外看到袋鼠、鸸鹋以及不同于中国的自然风光,初来乍到的学生们兴奋异常,拿着手机记录沿途风光。然而,兴奋过后,学生们很快就体会到了野外地质填图并不等同旅游,要克服很多困难。

除了最初让人兴奋的袋鼠、鸸鹋,穿过茂密的灌木丛时,恼人的苍蝇才是追随他们的“忠实伙伴”。有时,学生还要在似火骄阳下攀登近乎垂直的陡峭山坡。

地质实习的征途上,当地一种叫做三齿的草困扰着学生们,这种草茎细长而坚硬,很容易刺入衣服。在地质填图过程中,澳方教师为了让学生将地质现象看清楚,常直接用手拨去遮挡的草。学生以前从没见过这种草,也效仿去拔草,结果手上全是刺,钻心的疼痛让他们见识了这种小草的威力。

地质填图实习要求学生早上8点乘车出发,下午5点才能回到基地,每天在野外近9个小时,午餐就是早上准备的三明治。实习结束后回基地后,学生还要听讲座并整理白天的实习材料。

如此之大的实习强度虽然超乎了学生们最初的想象,但是没有一名学生临阵退缩。渐渐的,学生开始适应并积极融入当地环境。每天的早饭,由学生们轮流值日完成,虽然餐饭简单,但每天中午在野外席地而坐一起吃午饭时,与澳方学生谈话说地,让学生们从疲惫中放松下来,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澳方学生经

常会讲解实习中遇到的矿物、岩石、构造现象,听不懂的学生会记在本子上,方便回基地之后查找。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地质实习,一次不为分数、只为与地质零距离接触的奇妙体验。”实习团队成员张霄羽在微信朋友圈里感叹道。

## 国际范儿队伍开阔学生视野

对于参加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野外地质实习的学生们来说,最为惬意的时光要数体验野外地质填图“实战”的一次填图区露露。

完成一天高强度的填图后,在一片空旷的地方,学生们搭起帐篷、做晚饭。晚饭后,师生围坐在篝火旁聊天、取暖,欣赏纯净的星空,倾听异域风情的音乐,放松一天工作后疲惫的身心。

“这次实习强化了填图技能,锻炼了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掌握了一些野外急救知识,还体验了野外露营的乐趣。”参加实习的学生郑宇航感受到了野外地质实习的魅力。

野外阶段的工作完成后,学生要对地质填图“战果”进行整理,并转绘到标准的透明纸上。最终实习报告要求使用英文撰写,尽管学生英语都不错,但是真正用英语写报告,学生们还是有点不适应。但是,大家还是逐渐适应了说英语、写英语的环境。最终,所有学生都完成了实习要求的各类图件以及英文报告,并且得到了澳方主讲教师的认可和称赞。

18天的地质实习,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能力,同时让他们体验、实践了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第一次走出国门的同学们,由于不习惯澳大利亚的食物,抽空就会动手做中国菜,并邀请澳方师生品尝,来自澳大利亚的助教被中国菜征服,试过后大呼:“太好吃了!”

在这些朝气蓬勃、永不言弃的学生身上,李占轲看到了中国地质工作的未来。

“同学们在澳大利亚野外地质实习中,其专业素质、体能素质和综合素质,得到了国外同行的高度认可。虽然同学们远离祖国、学校和父母,但是野外实习中没有人喊一声苦,叫一声累,克服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最后收获了知识,提高了技能,锤炼了意志。”李占轲欣慰地说。

# 全球气候变化与大学的新角色

■保罗·查特顿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问题、各种刺激的时代。其中,气候问题无疑是大家十分关注的话题之一,因为这是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甚至未来生存的大问题。

去年11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强调,我们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在未来10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从而避免全球气温上升带来的危机。气候环境保护组织——“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一直在英国采取相对直接的行动,向民众警示气候一旦崩溃可能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可怕后果。

如今,全世界的青年们已经行动起来,成千上万的高校学子也正在为新的与气候科学关联的教育而奋斗、行动。此外,全世界有数百个城市、城镇,甚至很多国家也都在强调全球气候状况。这意味着,大学也需要塑造一个全新的公民角色,参与到气候环境保护中,以帮助应对气候崩溃带来的问题,支持社会快速向零碳过渡的转变。

在英国,一些大学已经挺身而出,共同迎接挑战、应对气候紧急情况。布里斯托大学于2019年4月开始投入到气候相关活动和教育中,格拉斯哥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贝尔大学和兰卡斯特大学也紧随其后。

在全球气候危机的情况下,大学究竟该如何做?

首先,大学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建筑,其中一些已经制订了相当完善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但是气候应急管理问题远远超出目前我们已经做到的。因此,高校需要改造所有的建筑设施,以确保它们在未来10年内实现零排放。

从高校爬满绿色植物的墙、垂直花园、屋顶农场和以水为中心的设计可以看到,绿色校园发展十分重要。高校大量的绿化土地储备还可以用来吸收碳排放、生产可再生能源等,从而减缓宝贵栖息地和物种损失的速度。

此外,高校还需要在教职员工和学生中进行大规模的宣传、设置积极的应对措施,比如只允许在校园内使用电动汽车,并将大学停车场重新规划为微型移动中心,这样人们可以在那里共享或租赁电动汽车、踏板车以及自行车。大学也可以通过其教学和学习活



如今,我们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大学应进行彻底的变革,以引领应对气候危机的道路。

动为未来气候环境保护带来巨大的影响。所有的教学和学习者都需要重点关注“10年内创建零碳社会(社区)”这一紧急任务。这将为各个学科带来更多的学习、扩展机会。

总而言之,大学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中扮演的新角色,将支持大学师生以更积极的心态,利用其机构影响力来推动公民领域内气候环境保护的议程,同时也能激励、带动政府、企业家等采取类似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

(作者系利兹大学地理学院未来城市学教授,许悦编译)